

清以来山西沿黄市镇的历史、景观和地域社会^{*}

——以晋西碛口镇为中心的考察

张俊峰 白如镜

内容提要:康熙末年,在河套地区开发与蒙粮内运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碛口凭借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开始兴起,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沟通华北与西北两大经济区的综合型商运码头。民国时期,伴随着晋蒙黄河水运的衰退,东西双向性质的晋陕货物集散成为其主要商贸形式。不同于多数脱胎于乡村聚落的市镇,碛口自兴起之初就呈现出纯粹的商业景观形态,镇城空间沿黄河与湫水河岸线性展开,最终定型为“五街区”形制。鉴于其经济地位,从咸丰初年通判衙门和厘税局的相继设置开始,地方政府对碛口直接的行政与经济管控从未中断,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商人家族为主导的社会运行秩序。民国初期,商人群体通过成立商会实现了内部权力关系的整合,并在复杂的地方权力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关键词:河运 市镇 商业 景观

黄河作为北中国最大的河流,在不断塑造着流域内地理景观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运兴衰和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其中,河运之利即是黄河与人类文明互动的一个重要方式。万里长河,在内蒙古境内蜿蜒曲廻,哺育了富饶的河套平原,转而自北向南,穿过黄土高原,流转经晋,在隔断山陕之间陆路交通的同时,也孕育了一条民众赖以生的水上通道。在清至民国时期的近300年里,黄河北干所流经的晋陕蒙河段,水上交通相当发达,成为西北诸省连接山西和京津地区货物流通的重要通道,谱写了黄河中游航运史上的一段盛世。翻开这一时期晋陕峡谷沿岸的方志资料,几乎都可以找到关于黄河水运的记载。同治《河曲县志》载:“乡人之耕商于边外者络绎不绝,宁夏之粳稻,口外之麦粟,造船编筏,顺流而下,河曲先食其利,而后波及于汾平诸郡”。^①光绪《保德州乡土志》载:“保德州赖有黄河,北由包头,南去河南,输运便通,商务受其利益”。^②凡此种种,不绝于书。

清代以降,依托晋商的兴盛,大批商人往来于晋陕宁蒙地区从事长途贩运贸易,黄河水上运道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山西黄河沿岸的众多水路码头凭借其区位优势,渐趋发展成为商业重镇。如居于北干流起点的河口镇,随着“口外垦殖日广,民殷物阜,出境之油、粮、盐、碱、甘草各货,入境之日用杂货,山西与归绥往来之商运,凡经河路者,皆以托属河口为唯一之码头”,故而在包头镇尚未兴起之前,绥蒙地区“归化城而外,以托河为第二商市,其市面繁荣所以远胜于他厅者”。^③乾隆年间的永宁州孟门镇,“蒙古之粟物船筏装载,水运沿河从上而下,卸聚孟门市廛之处。商贾往来,奔趋于此

[作者简介] 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太原,030006,邮箱:505727168@qq.com。白如镜,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太原,030006,邮箱:602665220@qq.com。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金元以来山陕‘水利图碑’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7AZS009)阶段性成果。

① 同治《河曲县志》卷7《艺文》,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第15页b。

② 光绪《保德州乡土志·格致篇》第2章《商务》,民国五年(1916)石印本,第25页b。

③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81《水路》第10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要,皆为之渔利而来也,洋洋乎诚属永郡一名镇也”。^① 壶口作为晋陕峡谷最大的水运障碍,经上游所来之船行至壶口遇“搔眼急流,坠落数十丈”,舟楫不能通行,须将货物卸下转为陆运,“船只则由依山开凿之浅槽徐运至”两岸的圪针滩或七郎窝,重新装货后沿水路继续下行。^② 其东汧之龙王辿就势发展成为“舟楫之所鳞次,商贾之所云屯地”。^③ 平陆县的茅津镇“地当水陆之冲,值八省通衢,自虞版以下依山凿径绵延百余里,扼关陕咽喉,由晋入豫者道所必经”,河东池盐、自禹门口舟运而来的煤炭及晋南棉花等大宗货物均需经此转运,以故“皇华冠盖之络绎,仕宦商旅之辐辏,纷至沓来,不胜纪计,而三晋鹺商辇运盐斤尤当孔道”。^④

对于沿黄市镇而言,虽然经济规模和具体的经营业务有所不同,但均系依托舟楫之利聚商为镇当是不争的事实。不同于“两市一水分”“人家尽枕河”的江南地区,在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原,我们似乎很难将一个城镇聚落与“依河而兴”“水阜码头”“临河街市”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清代以来,黄河中游发达的水运却造就了一批商贸繁盛的口岸码头,并成为其时北方市镇体系的重要类型之一。这些市镇依河而存,由此产生了独特的发展路径、经济模式、景观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其历史的解读无疑是透视沿黄流域经济和社会内核的重要窗口。然而,与当前山西市镇研究的薄弱状况相一致的是,学界围绕该类市镇的讨论仅仅停留在概略介绍它们的发展历程及商业规模等方面,如张世满在清至民国初期晋蒙商路的研究中,置专章梳理了河路沿线之磴口、河口、包头、碛口等镇的兴衰变迁。^⑤ 至于更为翔确的聚落史实还原和有深度的微观个案研究仍十分欠缺。

从传统市镇史研究的大环境来看,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一向是该领域的核心与热点,其研究理论、方法、视角等也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近年来,随着华北城镇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推进,市镇亦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许檀利用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对华北的著名商镇周口、赊旗、朱仙、北舞渡、紫荆关、清化、周村等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考察,通过量化分析着力展现这些商镇的发展脉络、商业结构、商业规模、流通范围等,不仅在资料和方法上有很大创新,而且开拓了一条通过对典型市镇的长时段个案研究来揭示北方市场实态的重要路径。^⑥ 不过,我们在借鉴该类研究模式的基础上,也应该认识到,市镇并非一个仅有店铺、集场、商贩等要素的贸易中心,而是各色人群和景观所结成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地理实体,其背后存在不同时空上的复杂历史过程。无论如何,采用个案形式对市镇历史的考察和还原,不能片面地局限于“商业发展史”的层面,还应当追求市镇“整体史”的学术理念,尝试从多角度再现其总体性的聚落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以有着“九曲黄河第一镇”之誉的碛口镇为例,通过对长时期记录和保留下来的方志、族谱、碑刻、文集、社会调查等资料以及口述史料的收集与解读,以勾勒该镇自清代以来的聚落演进历程为主线,将环境、商业、景观、人群、社会等要素融入特定的时空维度下进行探讨,动态地展现传统时期一个山西沿黄市镇的复杂历史全景,希冀能够对推动历史时期北方市镇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崛起于河山之间:从“大同碛”到“碛口镇”

碛口镇位于山西省最西部,民国《临县志》载:“县境四面皆山,湫水中流,自东北而西南夹水入河,其川口不过里许,名曰碛口,实为临县之门户”。^⑦ 西与陕西吴堡县的薛家港、丁家畔等隔河相望;

① 咸丰《重修孟门陈氏宗谱》,柳林县政协编印:《柳林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印行,第9页。

②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51《兵防八·河防》,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第51页a。

③ 《创建龙王辿孤魂祠碑记》(清代刊刻,具体年月不详),碑存吉县壶口镇马王庙院内。

④ 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之下《艺文》,民国三年石印本,第74页b。

⑤ 张世满:《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 相关研究参见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⑦ 民国《临县志》卷9《略·山川》,民国六年铅印本,第7页b。

东接西头村,背依卧虎山,山后为西湾村,再东北行是侯家圪台;南隔湫水河为河南坪、李家山;东南隔湫水河则是寨则山、寨则坪等。黄河自北向南奔涌而来,流经卧虎山脚下,湫水河在山洪暴发时携带着大量沙石拦腰汇入,经年累月,在入口东岸堆积成一个大型砾石滩,下游河道受到挤压陡然变窄,形成明礁林立、暗礁无数的险碛。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甘泉沟水利记》载:“临邑湫川北自兴县而来,自县南三交叉西南折而出大同碛口,其间千沟万壑之水,会归于此而入黄河”,^①“碛口”的名称正是由黄河与湫水交汇产生的“大同碛口”而来,然“碛口之名已古,而碛口镇之名则自清乾嘉间始”。^②关于聚落的早期历史,仅可从有限的文献资料中拼凑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按光绪《永宁州志》所言:康熙年间,岁大祲,西湾村人陈三锡“惻然隐忧,因念北口为产谷之区,且傍大河,转运匪难,遂出已资于碛口招商设肆,由是舟楫胥至,粮果云集,居民得就市,无殍饿之虞,三锡之力也,至今碛口遂为巨镇,秦晋之要津焉”。^③这是笔者目力所及碛口镇草创之期的最早记录,无论是后世的史料记载抑或当地口口相传的历史,“碛口为巨镇繁富实始于三锡”^④的说法几为定论。因此,以陈三锡为代表的陈氏家族与其聚居之西湾村无疑是观察碛口创兴历史的窗口。

约在明末崇祯年间,陈氏先祖从“岱坡”(今属方山县)迁居于永宁州文北都,“一姓二户,父老相传,二户原系同宗”,后因里甲审编,二八两甲开始分化。“寨则坪三宽等、霍家沟三思等、西头村三让等为一户”。二户则隶于八甲,散居各方,“或居圪垛村,维孝、三考、秉明等是也,或宅西头上,满兴、满柱、满梁等是也,或筑王家山,满月等是也,或居于岐河两村,秉仁、秉户、秉亮、秉礼等是也”。居于西湾村之一支,“上系一祖曰先儒公,下列五祖一曰先谟公,二曰先讲公,三曰先思公,四曰先讼公,五曰先诰公”。^⑤经祖辈的创业兴基,从岱坡迁居的陈氏两户,历经数代后已是门丁兴旺,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西湾先谟公曾孙陈三锡即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关于陈三锡的生平,家谱与志书中均无详注,只可确知其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5),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康熙三十五年,山西遭遇“数州县歉收,米价甚贵”的局面,康熙帝命陕甘总督吴赫利用宁夏所到之船,“将湖滩河朔积贮米,或五千石,或再加多,量行装载,交(山西)巡抚倭伦,派贤能属员转运,顺流而下至保德州,比时价减半于民”。^⑥这一官方运粮救荒的记载,说明蒙粮内运的水路已于此前形成。在康熙五十七年撰修的《临县志》中,从罗峪、曲峪、孟门等沿河聚落均以“镇”的身份标注在《县属里道总览全图》上,^⑦它们理当已经借助河运之利发展起来,而此时的碛口地境,仍然只是以“大同碛”这一地理景观的形式出现,可能尚未形成聚落。康熙五十九年后,晋省连续两年遭遇大旱,“汾州府等属早无麦,斗米至八九钱,遣左都御史朱轼奏赈恤”,^⑧光绪《永宁州志》所书陈三锡购谷救荒的事迹,实可与本次灾赈事件相应证。这时的口外垦殖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连年丰收,所产粮食可供调剂山、陕之有无。正值而立之年的陈三锡借助灾赈契机,利用卧虎山麓的陈氏祖地,招商设肆,四方商客汇聚于此,开始有了市镇之雏形。但需要注意的是,碛口参与到黄河水运并非迟至创市之后,一方面,陈在选择招商地段时必然是基于该地已有一定的商运实践,另一方面,与碛口一径相通的侯台镇在此前已是临黄区域的一个重要集镇,而其存在之基础只能是沿黄各口岸的货物和商旅流转。

降至乾隆朝,随着口外垦殖日广,民殷物阜,出境之油、粮、甘草各货的大规模内运为碛口的接续

① 乾隆《汾州府志》卷30《艺文四》,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第52页a—b。

② 民国《临县志》卷9《略·山川》,第9页a。

③ 光绪《永宁州志》卷22《人物》,光绪七年(1881)刻本,第7页b。

④ 光绪《山西通志》卷143《义行录中》,光绪十八年刻本,第30页a。

⑤ 乾隆《陈氏家谱·陈氏家谱说》,薛林平等:《西湾古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183,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戌,《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58页。

⑦ 康熙《临县志》卷1《舆地志·图考》,康熙五十七年刻本,第4页a。

⑧ 乾隆《汾州府志》卷25《事考》,第36页a。

发展提供了契机。乾隆八年,山右境内“道路崎岖,不通商贩,虽丰稔之年,米价视别省加贵”。^①邻近的归化城、托克托城一带则连岁丰收,米价甚贱。山西巡抚刘于义遂向朝廷奏请从土默特地区运粮接济晋民,然“归化城等处,距太原千余里,舟车挽运甚难”,^②尤其是“以陆路转运,车骡雇价为费甚多,运到内地已与市价相去无几”。^③相比之下,走水路则更为经济便捷,刘曾于“保德州买米三十八仓,装入试运,不过四日,已至永宁州碛口”,^④最终选定以碛口为输转码头,采用水陆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奏折中,一条大概的粮运路线既已显现:

黄河自托克托城河口村起,至保德州之天桥,计水程四百八十里。又自保德州天桥过兴县、临县,至永宁州之碛口,计水程四百八十里。碛口陆运至汾州府,计二百八十里,运至太原府,计四百八十里,此处即可接济汾州、太原二府。又自碛口过石楼、永和、大宁至吉州之埽上,即禹贡之壶口也,计水程六百一十里。此处必需起岸陆行十里,至吉州之七狼窝下水,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河津县之仓头镇。自仓头镇以下船只甚多,可以接济绛州、平阳、蒲州、解州等处,无不毕达,且由河入渭,并可接济陕西。^⑤

对于民间商贩而言,通过黄河水路载运米粮入晋已相当普遍,如孝义“一邑之食多藉外来,商贩自延、榆、归化等处木筏装载,由黄河而下至永宁之碛口,复陆运经宁乡至孝,商贩多止孝义,汾、介又自孝义买去,故岁藉补给又获商人之利焉”。^⑥作为水陆节点码头的碛口,“毗连陕省直通边外归绥一带,商人远贩粟麦,装载皮船自黄河顺流而下聚集其地,汾郡属邑并太原平阳诸处俱资接济”。但在由永宁至汾阳的陆路交通线上有“黄芦岭横亘其间,羊肠盘结间不容轨,仅藉牲畜驮运为数无多,而囤积之处徒患壅滞”,为货物转运带来极大困难。乾隆四十四年,汾州知府雷汪度决意修整该路段,檄委冀村、柳林二镇的巡检分路勘察,由汾阳知县与永宁知州总理工程,凡三月告竣。^⑦又碛口至永宁的南山孔道,百余里山路“崎岖犹有所阻”,^⑧西湾陈秉谦“慨然独任,除捐已贖外竭力经营”,^⑨亦一律修整平坦,自此“轨辙通行,商贾辐辏,既无居奇之弊,亦无粮贵之虞”。^⑩

在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动下,碛口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巩固,并被冠以“碛口镇”^⑪的名号,加之“乾隆年间河水氾溢,冲没县川(湫水)南区之侯台镇,并黄河东岸之曲峪镇两镇,商民渐移居积于碛口”。^⑫至乾隆后期,它的商业规模已渐为上下游的孟门、侯台、曲峪等镇所不及,开始确立了其晋、陕、蒙商运码头的绝对中心地位。

那么,在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碛口因何能从众多的沿黄城镇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晋西的第一商品集散地?这就需要从其独特的区位与交通条件来找寻答案了。其一是有着天然的良港码头,碛口所处的黄河河段属于一个大拐弯,河面较为宽阔,水流平缓,有助于船舶停靠,而原本地势险峻的河道两岸,又恰好在东岸的卧虎山麓形成了一块牛轭形低地,为装卸货物和建造附属商业设施的理想之选;二是有陆路转运的良好孔道,湫川在万山罗列的秦晋峡谷中段冲开一个缺口,使得依傍于此的碛口成为晋西门户,沟通两岸,联系上下游,此地“虽无津渡,而沿河津渡十三处,必须

① 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② 《清高宗实录》卷203,乾隆八年十月己卯,《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22页。

③ 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④ 《清高宗实录》卷203,乾隆八年十月己卯,《清实录》第2册,第622页。

⑤ 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⑥ 乾隆《孝义县志》卷1《物产民俗》,乾隆三十五年刻本,第3页a。

⑦ 乾隆《汾州府志》卷34《艺文八》,第14页b。

⑧ 道光《汾阳县志》卷13《艺文三》,咸丰元年(1851)刻本,第58页b。

⑨ 光绪《永宁州志》卷22《孝义》,第8页a。

⑩ 乾隆《汾州府志》卷34《艺文八》,第15页a。

⑪ 乾隆《汾州府志》卷2《疆域》,第15页a。

⑫ 民国《临县志》卷9《略·山川》,第7页b。

取道于此”^①。更为重要的是，碛口的区位属于离汾州和太原最近的出口之一，水路运来的大批货物，在此转陆路后经永宁州可达汾阳，或经宁乡至孝义。早在雍正年间，雍正帝查知“山右需米甚殷，欲以口外之米运入内地，特遣归化城都统丹津相度黄河形势”，规划转运路线。丹津计划用木筏经黄河水利载运至河保营，再行陆路输转，但河保营地处“万山之中，不能转移，仍与晋省无益”，最终未能施行。^② 从中可见，碛口沟通晋中的陆路交通优势正是河保营等码头所不具备的。入清以来，经康雍两朝的积淀，乾隆时期的晋中地区已是“生齿殷繁，土狭不足食土之人”，东至太原南抵平阳凡三十余州县之食皆仰赖于碛口，广阔的经济腹地为其商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③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同碛”的存在被视为成就碛口镇的首要地理条件。因河床礁石遍布，上游下来的货船下行极其困难，不得不终止航程，靠岸卸货转为陆运，碛口也由此成为了晋蒙水路交通线的终点口岸。^④ 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在黄河中游水运的兴盛时期，经碛口下行的船只并不在少数。乾隆年间，大批装载蒙粮的船筏沿河顺流而下，卸聚于碛口稍下游的孟门镇集场。^⑤ 直到民国前期，“由包头、碛口所来船运货物以粮食、甘草、牛羊豕绒毛、皮革、红枣、粗磁船只等为大宗，行抵壶口”。^⑥ 为便于下行货船的管理，碛口商户专门成立了“下船行”组织，清末吉县壶口重修马王庙时，同兴县木行等一起参与了捐资。^⑦ 民国十八年，碛口粮商陈恩光等船运各项麦粮至河津销售，在行经龙王辿时被街长郭广立会通六股头强行征捐，省府查知“南路粮食缺乏，正宜彼此接济以通有无，商人运粮经过龙王辿，岂能由该街长等随意勒捐，似此形同诈财，尚复成何事体，而黄河运粮船只势将因此绝迹，粮路愈形阻塞”，遂要求吉县县长“查明确情，严行究办，并将捐麦如数退还”。^⑧ 凡此种种，均反映出碛口与下游码头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显然，对于碛口晋蒙商路终点口岸的定位并不妥当，大同碛也不可能是驱动其成为水陆码头的主因，大量商贩之所以要在此停船，核心是基于晋中地区市场需求拉力下的主动选择。

乾隆二十一年，碛口本镇迎来了一次标志性事件，即镇内核心公共建筑黑龙庙的重修。对于黑龙庙的创修时间，在乾隆年间重修时就已无法确知，只是“相传于明时，因河水漂来木植，创庙三极，正祀龙王，分祀风伯、河伯于左右，凡以风雨水三者……迨雍正年间，增修乐楼一座”。尽管只是一个传说，但至少可以说明其创修时间远早于乾隆朝，即使不在明际，也迟至清初就已经存在了。从碑记来看，此时的碛口镇“境接秦晋，地临河干，为商旅往来舟楫上下之要津也，比年来人烟辐辏，货物山积”。镇民在享受河运之利的同时，“每当风雨骤至，波涛忽惊之倾，则人人仓皇，呼神欲应，夫是以演歌舞，供牺牲”，为往来商旅、上下舟楫祈祷平安。但与黑龙庙旺盛香火所不符的是，庙内却是“荆棘丛生于阶，瓦砾狼藉于庭”。在陈氏家族的组织下，黑龙庙得以大规模补修和扩建。从总领工程的人员构成来看，陈氏在本镇的公共事务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时年已71岁的陈三锡，此前因赈济有功，获得了候铨州判的官职，携其孙“满琰、满瑜、满琇”等施银百两，并作为功德主列于首位，领袖人则是其族弟寨则坪陈三宽，其后的多位经理人中亦以陈氏族人为主。^⑨

对于这一时期镇内商业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商业结构和商业规模如何？重修碑记上镌刻的商号名目可以提供诸多有价值的信息，参见表1。

① 民国《临县志》卷12《略·兵防》，第6页b。

② 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③ 道光《汾阳县志》卷13《艺文三》，第57页b。

④ 参见张世满：《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第15—16页。

⑤ 咸丰《重修孟门陈氏宗谱》，柳林县政协编印：《柳林文史资料》第4辑，第9页。

⑥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51《兵防八·河防》，第51页a。

⑦ 《壶口马王庙布施碑记》（清末刊刻，具体年月不详），碑存吉县壶口镇马王庙内。

⑧ 《民字第四百三十号：吉县县长知照》，《山西省政公报》1929年第8期。

⑨ 《重修黑龙庙碑记》（乾隆二十三年刊），碑存临县碛口镇黑龙庙内。

表 1

乾隆二十三年重修黑龙庙集资商号统计

单位:两

商号名称	单位捐额	商号名称	单位捐额
长盛厂 广昌号	14	广裕号	37
兴顺号 三合铺 三德盛 永昌号 裕和号 同源号	12	复兴号 兴盛号 永兴厂 大昌号 裕源铺 昌泰益 通顺号 协盛号	8
玉积号 介休馆 木行 裕林厂 兴顺厂 义成号 长盛厂 万鑑厂 永兴厂 蔚林厂 合成厂 裕源厂	5	三合号 长裕铺 兴顺店 德盛号 万盛号 天成号 永盛店 兴盛店 永茂号 蔚昌号	2.4
天顺生 复兴店 协盛合 广全号 义合隆 万锦号	3	积盛铺 钰房 兴盛合 麻房、丝房 缸房 钻房	3.6
木行 太和店 二合号 三盛号	1.6	兴顺馆 兴盛铺 恒兴店	1.2
合计:商号 61 家,集资总额 338.2 两			

资料来源:据乾隆二十三年《重修黑龙庙碑记》统计。

由表 1 可见,乾隆中期的碛口镇上至少已有 61 家坐商。尽管大多数字号难以明确其行业属性,但大概可以辨认出的是,在为货物转运服务的粮行、过载店、木材厂等商铺之外,已有酒坊、麻房、丝房、杂货铺、饭馆等日常服务型行业。

乾隆五十一年,清廷限制性开放吉盐^①水运,为便于在山西境内转运销售,规定阿拉善盟之磴口为发运码头,至下游河口镇停泊储积,之后“陆运水运悉从民便”,而且“不必限定运盐数额”。^②自下最远可至碛口镇,“责成汾州府派委妥员输班驻扎该处弹压稽查,遇口盐船只到镇押令起岸,堆储零星贩卖”,^③不得越界运到下游州县。在这之前,吉盐只能在磴口至托克托城之间行水路,每年打造盐船 50 只,每船装盐 40 余石,计运盐 140 万斤;内地水运开通后的前四年,每年打造盐船多达 600 只,计运盐 1680 万斤,运销额增长了十几倍。^④至嘉庆十三年,陕甘总督长龄等奏请“于河口之南三百余里黄甫川地方为界,将磴口大使一员改为黄甫川大使,移驻该处,专司稽查,所有吉盐水贩,只准至黄甫川而止”,^⑤至此阻断了吉盐至碛的水路。在吉盐内运的黄金时段,大量的盐船行抵碛口经转,与蒙粮内运一起,共同推动了乾嘉时期碛口镇的成长。

二、“物阜民熙小都会”:市镇的成熟与空间形塑

道光朝以降,碛口的商业发达程度更甚于前,民国《临县志》言其“至道光初元,商务发达,遂称水陆小埠”。^⑥道光二十三年,告老还乡的永宁州举人崔炳文为黑龙庙题写楹联:“物阜民熙小都会,河声岳色大文章”。同年,黑龙庙再一次得到了重修,前后历时三年之久,工程浩大。永宁知州王继贤礼谒龙神,盛赞其“庙制之壮丽,结瑶琼,图云画仙,台雕榭楼,木广对阁连”,庙内规制“左风伯、右河伯,再左喜、贵、财神,再右金龙、仓官、白虎神,凡此皆辅佐龙神”,^⑦已非往日的草创小庙可比。

在工竣以后镌刻的《黑龙庙重修碑记》中,同样记载了大量商号的名目与捐资数额,为我们管窥彼时碛口的商业实态提供了直接史料。相较于乾隆中期,本次重修活动首次出现了外地客商参与捐资的情形,共计有 53 家,地域远至晋中地区的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灵石等,近有临县及永宁州所属之柳林、大武、吴城、军铺、薛村等镇。具体而言,尽管施银客商的数量与施银数额颇为有限,如除了商号数最多的柳林镇有 16 家之外,其余各城镇均在 5 家以下,但仍可显现出碛口与晋中各州县及周边地域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参见表 2。聚焦于碛口本镇,碑文在“本镇经理”的条目下列出了 24

① 吉兰泰盐简称吉盐、口盐,盐池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

②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 101-3-45。转引自梁丽霞:《阿拉善蒙古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9 页。

③ 《清仁宗实录》卷 61,嘉庆五年(1800)三月丙辰,《清实录》第 28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812 页。

④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 101-3-51。转引自梁丽霞:《阿拉善蒙古研究》,第 254 页。

⑤ 《清仁宗实录》卷 258,嘉庆十七年六月己巳,《清实录》第 3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497 页。

⑥ 民国《临县志》卷 9《略·山川》,第 7 页 b。

⑦ 《卧虎山黑龙王庙碑》(道光二十七年刊),碑存临县碛口镇黑龙庙内。

家商号名目,当属于镇内经济实力较强的铺户,另附一专碑记有本镇另外 73 家商号及施银数额,共计有 97 家。及至同治五年,距碛口不过 10 里的李家山大规模增修了该村的天官庙,笔者依据实地抄录的《重修庙宇碑记》统计发现,碛口本镇的施银商号竟达 168 家之多。^① 由此,从商人数量这一关键数据的变化来判断,清中期以降碛口镇的商业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

表 2 道光三十年重修黑龙庙集资商号统计

地点	商号数(个)	捐款额(千文)	地点	商号数(个)	捐款额(千文)
永宁柳林镇	16	34	灵石县城	3	4
永宁大武镇	3	3.6	平遥县城	1	1.2
永宁军铺镇	4	7.4	介休县城	1	1.2
永宁薛村镇	1	1	孝义县城	4	5
永宁吴城镇	2	2.2	晋州城	1	1.2
灵石双池镇	2	2	临县城	1	1
隰州大麦郊	1	1	碛口镇	97	—
汾阳县城	3	3.6			

备注:集资商号共 140 家,集资总额无条件做精确统计

资料来源:据道光三十年《黑龙庙重修碑记》(碑存临县碛口镇黑龙庙内)统计。

若进一步分析几通捐资碑上所载铺商的类型,可以发现,无论是客商抑或坐商,粮油行店仍为其中的主类,诸如大顺店、荣光店、锦荣店等均为镇内大型的粮油货栈,汾阳县城则有恒盛油店、丰泰油店、恒兴油店等。但同时又能观察到碛口商业发展的一些新气象,如在道光《黑龙庙重修碑记》中,出现了德盛染、复盛染、四合染、恒顺染、天成染、德顺染 6 家染坊,染坊的主营业务是将货行运来之布匹进行上色加工,另见道光时期该镇的“花布行”“白布行”两家牙行参与了镇南长兴桥的修建,^② 这些信息至少可以说明彼时碛口由东到西的布匹转销业务已有一定的基础。同治《重修庙宇碑记》中出现了万鉴当、兴顺当、丰和典、永成当等 11 家当铺,说明金融业已成为本镇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末碛口镇的贸易类型和腹地范围持续扩大,尤其是具有双向性质的晋陕贸易获得了充分发展。据张萍研究,清末陕北以榆林为中心形成区域商业中心,而由其所联系的二级中转城镇却并不在陕北境内,恰为处于山、陕交界的碛口。碛口镇是本省运往陕北内陆州县布匹、杂货、铁货的中转枢纽,也是陕北以及甘、宁等省药材、土产、牲畜等输入山西的水陆码头。^③ 榆林府神葭厘局出入货品大多以碛口为中转地,“所收货物以藤油、甘草为大宗,获(藤)油出产口外及府谷一带,贩者或船运,或驼运,均至山西碛口落地销售……往南之货,除牲畜一项由上游各渡河转贩太原、顺德等处外,余皆以碛口为卸载之地,往来之货又多以碛口及汾州为起运之地”。^④ 咸丰九年,山西巡抚英桂奏请抽收本省厘税,在省城设立筹饷总局,办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并于四路隘口设总卡七处,委员经收,其中的西路总卡即设置在碛石镇。^⑤ 宣统二年,碛口厘局年收税额可达“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两零五钱零六厘”,仅次于同期 27 个百货厘局中的拦车、槐苇、忻口三地,足见其时经碛口转销的货物规模之庞大。^⑥

① 《重修庙宇碑记》(同治五年刊),碑存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三官庙内。

② 《张家山长兴桥碑文》(道光二十二年刊),碑存临县碛口镇张家山黄河岸边古道旁。

③ 张萍:《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三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6 页。

④ 陕西清理财政局编:《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金》,清宣统元年(1909)排印本。

⑤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389 页。

⑥ 《山西全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第 1 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3 辑《货物税》(上),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61 页。

表 3

民国初年重修黑龙庙集资商号统计

地点	商号/机构数(个)	捐款额(两)	地点	商号/机构数(个)	捐款额(两)
萨县包头镇	29	136	临县城	1	35
托县河口镇	8	70	河曲县城	4	15.4
绥德县城	22	—	保德县城	20	37.2
府谷县城	13	101.5	离石孟门镇	22	45
平遥县城	26	221	离石下三交	3	16
汾阳县城	22	142	介休张兰镇	9	—
孝义县城	9	26	临县招贤镇	3	36
祁县城	9	66	临县堡则峪	10	15.2
徐沟县城	1	—	临县曲峪镇	19	50
介休县城	6	—	临县南沟镇	1	12
文水县城	2	10	碛口镇	351	—
离石县城	6	63.4			

备注:集资商号共 596 家,集资总额无条件做精确统计

资料来源:据民国五年《重修黑龙庙碑记》、民国八年《卧虎黑龙庙重修各镇施银碑记》(碑存临县碛口镇黑龙庙内)统计。

民国初年,碛口黑龙庙再次进行重修,大量的客商与坐商参与捐资。参见表 3。民国五年为重修下庙事镌刻的《重修黑龙庙碑记》,载有包头、河口、河曲、保德、府谷、孟门等地客商 129 家,本镇坐商 132 家;民国八年为重修上庙事镌刻的《卧虎黑龙庙重修各镇施银碑记》,载有汾阳、祁县、孝义、文水、介休、绥德等地客商 142 家,本镇坐商 219 家。与前述道光中期的集资情况比较来看,不仅客商的整体数量与施银数额大幅增加,而且其地域分布也在原先的临、离两县及晋中的基础上,新增了晋北、陕北及蒙地,尤其是北部晋陕蒙黄河水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几乎都参与了捐资,这无疑是当时碛口镇经济腹地范围的真实反映。就碛口本镇而言,在商会的统一主持下,前后两次工程的捐款商号没有复施者,据此可推断碛口镇上当时至少有坐商 351 家,已较同治年间增加了两倍有余。另据民国十三年的人口调查资料显示,全镇计有民户 184 家,商户 194 家。需要说明的是,碛口的特别之处在于镇内没有一户住家居民,全系与商务相关的从业者,若放宽统计标准,其真实商户数量应在 300 家以上。相形之下,同期内黄河沿线的孟门、黑峪口、罗峪口等市镇,以及周边的临县、离石、三交、柳林等城镇,其商业规模都较碛口有不小的差距。

表 4

民国十三年碛口镇及周边城镇户口统计

城镇名称	户数(户)		民商合计(户)	人口数(口)		男女合计(口)
	民户	商户		男口	女口	
临县城	537	144	681	1118	1242	2360
离石城	626	152	778	2335	1361	3696
碛口镇	184	194	378	322	346	668
吴城镇	198	68	266	423	368	791
柳林镇	701	130	831	2408	1410	3818
孟门镇	104	15	119	336	248	584
大武镇	377	66	443	926	799	1725
曲峪镇	179	—	179	533	459	992
白文镇	355	98	453	1108	956	2064
三交镇	658	34	692	1770	1578	3348
招贤镇	30	26	56	97	88	185
兴县城	627	201	828	1485	1328	2813
黑峪口	215	32	247	694	525	1219
罗峪口	164	25	189	457	344	801

资料来源:据山西自治筹备处 1924 年编印的《山西各村户口调查表》之离石县、临县、兴县数据统计。

这一时期的碛口,已经完全转变为一个沟通华北与西北两大经济区的综合型商运码头。京绥铁路通包后,包头“下游达托克托县之河运,遂一蹶而不能复振”,致使从河口顺下至河曲、碛口的各类货船也“殆已绝迹矣”。^① 随着晋蒙黄河水运的衰退,东西双向的晋陕贸易更显发达,成为本镇的主要商贸形式。陕北土货及天津、石家庄、太原的洋货均要在此地集散,行号及业务分作西班、东班买卖,每日西班牙船只日来几百艘,满载油、盐、碱、粮食、皮货;东路骆驼几千头,满载匹头、染料、煤油、纸烟、洋火、丝织毛织品。^② 民国十五年编撰的《商业课本》对当时经碛口集散的货物类型有详细记载:

西路:来货皮、毛、碱;去货布匹、棉花、生铁货、瓷器。

东路:来货河南布、洋布、省南棉花、熟铁货;去货皮、毛、油、碱、粉条、粉皮。

南路:来无货;去货小米、麦、豆。

北路:来货油、盐、鄂套碱、杂粮;去货无。^③

据时人实地调查:全镇铺商以货行、过载行、油粮、盐碱行占多数,瓷、铁、麻行等次之。货行在本镇约占1/3,其主要业务是贩卖棉花及布匹之类,布匹多数由陕西及宁夏等处的货商批发,棉花则出售于天津等地。以上货物来源,除棉花及少量的本地布出自附近各村外,其余布匹出自河南、河北地区。过载行约十余家,即专营货物转运的货栈,货运范围西至宁夏、东北达天津。油行几乎都是由汾阳人开办,来源最初以包头为主,后口外来油日少,多数从陕北各地转运到碛,统称西油。销售的地域以汾阳、平遥、交城、文水等晋中各县为主。盐行和碱行共有十余家,二者通常合业销售,货源在包头、鄂套及陕北之神木等地,而销货之大宗在汾阳、平遥等处,及沿河南下的晋南西部。粮行约有十余家,所贩货物以小米、小麦、黄豆及高粱为主。货源除临县的白文镇及本镇附近外,大宗仍是从河套地区转运,不过当时口外来粮已大为减少了,销售地址以晋中、晋南西部为主。磁铁行有十余家,除磁由保德沿河而来,铁由祁县及晋南一部分外,其余则完全来自镇东四十里距离的临县招贤镇。绒毛行是本镇大商行之一,货源地系陕北、甘肃及宁夏等省,大宗销售于天津等处。此外,为商品转销和周边居民服务的手工业也有一定的规模,全镇有磨坊、染坊、毡房、木厂、铁铺、毡氈房、绳麻铺及罗底首帕庄等作坊40余家。^④

表5 民国时期碛口镇代表性商号一览

店铺名称	经营业务及其他信息
裕厚泉	粮、油、酒行及磨坊,院子中有40孔窑,又称“四十眼窑院”
广生源	板头货、洋什货、中药
永生瑞	过载行
玉泉成	干粉店,常喂猪四五百头,存干粉10数万斤
天义魁	天津庄客,经营洋铁器具及匹头货入口,养一来百数十头骆驼
永泰祥	油行,每次购入10余万斤
天聚永	油行
集义东	皮货行
兴隆泰	染料行,并营各种洋什货
利元通	染料行,资本一二万元
兴隆昌	烟行,老店开设在曲沃,分店遍设山西全境
万兴德	分金炉

资料来源:《碛口商业初步调查》(1947年10月18日),见于张扬等所编的《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册第42页。

① 《绥远通志稿》卷81《水路》第10册,第176页。

② 《碛口商业初步调查》(1947年10月18日),张扬等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③ 山西省教育厅编辑处编:《商业课本》第1册,转引自陈志华:《古镇碛口》,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④ 刘光辅:《山西碛口镇概况》,《党政半月刊》第14期(1929年11月1日)。

商业的兴盛也标志着镇城的空间营建步入了成熟期。西湾陈氏在创市之初,为逐水运之利,择基于“两水夹一山”的牛轭形山麓地带招商设肆,在空间上独立于周边的西湾、西头、寨则坪等“原始村落”,呈现出完全的商业景观形态。由于本镇与周边地域插花分隶于临县、永宁两州县,致使镇域空间有了“州地”与“县地”之分,随着市镇商业的成长与聚落范围的展拓,州、县地轳域分异的情形愈加凸显,在嘉道年间刊刻的几块碑石上多见有“州县地”^①“州地斗行”“县地斗行”^②等相关的记载。至于二者的区域划分,从民国初年临县与离石^③争夺该镇货船捐税的情形来看,临县提出征捐的货船渡口全部属于该县地境,大概可以推知面临黄河的南北向地段以“县地”为主,境接西头村的湫水河沿岸地段则为“州地”。^④

受限于水陆码头的性质,以及背山临水的地貌条件,镇内店铺和道路的修建并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只能沿黄河与湫水河岸边线性展开,形成带状格局。相较而言,此类聚落结构似乎是晋陕沿黄市镇的常态。譬如,居于碛口稍下游的孟门镇,“镇址虽近河岸,但距河尚有里许,镇高河低,河干以上挨镇筑有石墙一堵,高四丈有余,盖建于城下防水者也。镇内子午为街,清乾隆年间从南至北有一里之余,其形之直如矢,两厢排列,东西图隙,其势之比如栉”,^⑤这一聚落形态几乎可以直接嫁接到同时期的碛口镇。由于装卸货物的码头均位于黄河河滩,每天来往的船只舳舻相接,为便于货物转运,经营粮油、皮毛的商人多数选择在码头之上的地段修建货栈,形成了西市主街的雏形,镇人俗称为“后街”。面临湫水的地段平坦宽阔,作为东去汾阳、太原旱路的起点,大型超载行多集中于此处倚山建店,形成了东市主街的雏形,又有“前街”之称。本镇现存的商铺匾额中有五块是乾隆年间就已挂牌的,乾隆壬寅年(1782)的“永隆店”,位于西市街近南端的位置;乾隆己酉年的(1789)的“永顺店”,在西市街中部沿街;乾隆甲寅年(1794)的“永裕店”,在西市街北部,已不临街;乾隆己酉年的(1789)“笙泰店”,位于东市街中部北侧;乾隆壬子年(1792)的“祥光店”,在东市街尽头南侧,也即镇区的东端。可见,清中叶的碛口镇上已有大量经营着日常生意的固定商户,且由北转东南的弧形主街市也基本成型。

随着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空间上即表现为原有格局的密集化趋势,以及镇域整体空间的展拓。道光中期,黄河沿岸的西市街东侧密集分布着一批大型货栈,如锦荣店、荣光店、大顺店等,主街两侧的聚落缝隙逐步被填充,在沿黄台地的南端形成了一段连接东西两市的主街,时人称其为“中市街”。咸丰五年汾州府通判移驻碛口时,镇城的核心区域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修建衙署,只能选址于东端西云寺后的一块高地上。降至清末,沿主街两侧的东西向延展成为镇城空间变化的主要形式。缘于聚落中心的集聚效应,中市街外侧的临河地段又逐渐形成两条辅商业街,随名为“二道街”和“三道街”,碛口镇城至此扩展为东、西、中、二道、三道五个街区。据民国六年测绘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碛口镇图”所示,镇内的街市十分稠密,部分街区已经逼临河干,空间开发趋于饱和。参见图1。

同一时期,黄河和湫水迭起的水患问题,又不断重塑着镇城的街市形制。早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遇临县境内山水陡发,“永宁州属之碛口镇等四村庄冲塌房屋四十八间,淹毙大小男女二十六名口”。^⑥而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碛口黄河水涨十余丈,沿河淹毙人畜冲塌民房无数;道光二十六年,碛口黄河水涨;光绪元年六月十五日卯刻,东北二川同时暴涨,水高三丈,漂没村舍地亩无

① 《嘉庆二十五年重修西云寺施款人碑记》(道光九年刊),碑存临县碛口镇碛口中学院内。

② 《张家山长兴桥碑文》(道光二十二年刊),碑存临县碛口镇张家山黄河岸边古商道旁。

③ 民国元年改永宁州为永宁县,民国三年改永宁县为离石县。

④ 刘光辅:《山西碛口镇概况》,《党政半月刊》第14期(1929年11月1日)。

⑤ 咸丰《重修孟门陈氏宗谱》,柳林县政协编印:《柳林文史资料》第4辑,第9页。

⑥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署理山西巡抚印务湖南巡抚觉罗巴延三奏为奏闻委勘被水情形抚卹完竣事,《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第4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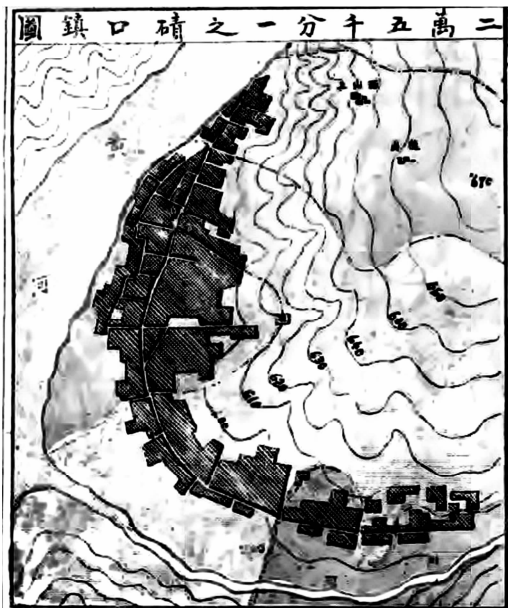


图1 民国初期礮口镇聚落形态图

资料来源:图片载自民国《临县志》卷1《疆域图一》。

数,礮口黄河水亦异涨,壅遏逆流二十余里。”^①由于东市街区地势较低,又曾多次被洪水浸入,商户们只得选择加高地基,街道两侧遂形成了特殊的“高圪台”铺房景观。而黄河沿岸南段至两河交汇处的地境,水患危机一直阻碍着市镇空间向此处延展。至民国二十四年,湫水河泛滥成灾,礮口街开始被冲毁。民国三十五年,礮口二道街冲毁严重,同年湫水河继续冲毁前街。^②据《临县志》记载:“民国三十年开始至建国后的1951年,大水五次冲击礮口,一道半街被水冲走。”^③水患亦是沿黄市镇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与礮口相邻之孟门镇的水患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河水侵城后的诸多细节。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河水溢沸,泛滥为殃,舟游于街,涛响于市”,到咸丰六年七月,“大河汹涌更甚,连云广厦倏尔陷入狂涛巨波之中”,镇民“转瞬遂无立锥之地,男女老幼抱携携持露宿于野”,至此之后,镇城“旧有田芦集市尽行推没而渺无踪迹”。^④

三、官厅分驻:市镇的管理与地方权力关系

便利的水运条件,冲要的地理位置,使礮口从乾隆初年成为指定的粮运码头开始就已进入了官方视野。而后,针对其吉盐转运口岸的重要地位,对盐务的管控成为官方势力涉足礮口的一条主线,并由此延伸到市镇管理的其他方面。自乾隆末年开放吉盐水运以来,即责成汾州府“派委委员输班驻扎该处弹压稽查,遇口盐船只到镇押令起岸,堆储零星贩卖”。^⑤道光年间,永宁知州龚梅奉率檄巡盐礮口,缘其“滨大河,地与陕西接,奸宄窟其中,民悍而顽”,龚氏选择长寓镇内,带领“两仆三隶日厉河孺,与父老言孝第信义,闻者大悦,数月不答一人”。^⑥至清后期,随着人口的大量集聚,治安问题亦愈发凸显,此前定期输班巡查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宜该镇的实际需求。咸丰五年,山西巡抚王庆云奏请将汾州府粮捕通判“改为盐捕通判自府移驻,设衙门严缉口蒙等盐下礮”,^⑦又“量移营汛酌添河快巡船,并准审理词讼,责令弹压巡辑”,^⑧时人称为“三府衙门”。

官衙的入驻昭示着官方对礮口行政与经济管控的强化,尽管会对初兴之时既已奠定的以商绅大族为主导的社会运行秩序形成冲击,但官、商之间更多是以一种配合的“姿态”共同维系着这一商贸重镇的正常运转。“盐捕通判”之名实则并没有将其职责限定于盐务,尤其是准其审理词讼案件,显然是被赋予了广泛的理民之权。时至今日,礮口当地依然流传着不少“通判老爷”的故事,较有代表性者如该镇上庙的建修历史:

① 光绪《永宁州志》卷31《灾祥》,第3页b。

② 王洪廷:《礮口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③ 临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临县志》,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④ 咸丰《重修孟门陈氏宗谱》,柳林县政协编印:《柳林文史资料》第4辑,第9页。

⑤ 《清仁宗实录》卷61,嘉庆五年三月丙辰,《清实录》第28册,第812页。

⑥ 郭尚先:《郭大理遗稿》卷4《文二·龚梅严刺史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⑦ 光绪《山西通志》卷79《公署略上》,第11页b。

⑧ 王庆云:《石渠余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清代咸丰年间,三府衙门老爷的太太病得不轻,师爷买了三只羊,请太太一同到三里之外的西咀岔村华陀庙求神治病。进得庙去,把羊拉到神像前,按习俗给每只羊从头到尾泼了一盆冷水,有两只羊打了个激灵,这表示华陀答应了请求。但有一只羊纹丝不动,太太赶紧向华陀额外许愿,如果病好了,就在磛口造一座庙来供奉。后来病好了,通判老爷就利用职权,在黑龙庙的上方建起一座庙供奉华陀,称为上庙。^①

从实而言,由伍贰官出资建造一座规模宏阔的庙宇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之上庙正殿中央供奉的是关帝像,亦兼磛口会馆之用,显然是本镇商业发展推动下的产物。驻镇通判或许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该庙的修建,便被商民赋予了创庙者的身份。但这一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传说,至少可以反映出官方势力对本镇地域社会的塑造有所影响。

乾隆朝以后,西湾陈氏在本镇公共事业中仍居于领导者的地位。陈三锡嫡孙陈满琳于嘉庆二十二年总领本镇西云寺的重修,又因西湾村旁磛路为商贾往来的必经要地,逼近湫水河干,“屡为河水所圯,人辟行高阜,坡陀隳颓,颠仆踵接”,^②于是在山麓“购地数亩为官道,以便行旅”。^③道光中期总领重修黑龙庙者,系陈三锡第五代孙陈辉章,其随后又出资整修了西湾村至磛口的商道,功绩甚佳。同治元年陕甘回民起义,揭竿之民盘据陕北地区,汾州以西的四州县正当其冲。因磛口实扼晋西之要,办理团防必须以此为关键,即举磛口通判汪韶光为沿河团练总办,陈氏主动解囊出资,与“本邑总兵李能臣、临邑状元张从龙等共事守御,功劳卓著,钦加都司衔、蓝顶、五品军功,饬昭武大夫”。^④

凭籍商业上的成功,李家山李氏成为磛口镇上又一重要家族。民国《李氏宗谱簿》载:“李氏于明成化年间,由临县上西坡村迁住临县招贤都三甲李家山村,遗传十有余世。”^⑤迟至乾隆中期,李氏就已经涉足磛口码头的转运贸易,四世孙文祥、文俊、文就、文朝等还参与了黑龙庙的重修。^⑥同治五年,八世孙李登祥总理重修本村的三官庙,但因工程浩荡,实非李氏一家独力所能,于是得到了镇商的鼎力支持,参与集资的商号达168家,足见李氏在磛口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光绪二十七年,通判祝荔材组织本镇商绅创办永临义学时,敦请李香亭董理工程,其“以簧舍之兴废,国家之盛衰,而于地方文风,亦大有裨补,于是毅然担任,惨淡经营,不遗余力,监督工程,虽盛暑不少懈,历半年之久,校址落成。缙绅之家,多送子弟入学,济济一堂,文风为之丕变”,迨民国二年义学改为两级小学校,李氏又应校方邀请身任董事,前后凡十余年。^⑦

清民之际,在聚落发展达到鼎盛的同时,磛口的政治环境亦日趋复杂。光绪三十三年移置通判于口外东胜厅,又查磛口“地方乃永宁与临县分辖之区,相距既遥,亦未可无官分驻”,旋即令汾阳县冀村镇巡检“移驻磛口,将通判所管事宜改归该员经理”。^⑧民国成立后将巡检裁撤,继之“添设警察分所,分隶离临两县”,各委巡官一人领警兵数名维持地方治安。^⑨民国四年,两县政府又相继设置县佐驻镇理民。

插花分治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市镇管理的复杂程度。在治安方面,警政机关的地域管辖限制,导致了执法上的相互掣肘或推诿。对于各项公共事业,也常有彼此牵制的情形发生。其中,民国

① 陈志华:《古镇磛口》,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② 乾隆《陈氏家谱·陈满琳》,薛林平等:《西湾古村》,第148页。

③ 光绪《永宁州志》卷22《孝义》,第9页a。

④ 乾隆《陈氏家谱·陈辉章》,薛林平等:《西湾古村》,第148页。

⑤ 民国《李氏宗谱簿·序》,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吕梁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⑥ 《重修黑龙庙碑记》(乾隆二十三年刊),碑存临县磛口镇黑龙庙内。

⑦ 民国《李氏宗谱簿·香亭府君行述》,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吕梁卷》,第70页。

⑧ 《山西巡抚恩等奏为秦晋边界郡王札萨克两旗地方事务日繁拟请增设厅治以晋省磛口通判移驻折》,《申报》1907年4月14日,第26版。

⑨ 民国《临县志》卷12《略·兵防》,第7页a。

初年永临义学的改设过程,可视为临、离两县权力与利益博弈的一个典型案例。由前文可知,永临义学原系通判祝荔枝组织商绅共同创办,民国二年奉文改为离临两级小学校。原办绅董拟就碛口来往货船按斤收捐,以充学校经费,呈请两县县长转呈省政府鉴核。不料离石县的士绅,会通县长,竟私自扣留了临县方面的文件,又将货船捐改称为离石县差徭后呈省。该事最终被临县旅省的同乡得知,于是竭力交涉,双方就此反复拉锯。为平息争端,省府决定将捐税按十成分派,六成充作学校经费,二成拨归离石,二成拨归临县。质言之,这一事件实则是临、离两县对碛口货船捐税的争夺。在临县看来,因征捐的渡口完全为临县地境,纯系将临碛之捐用于两县合办的教育事业,原本就已是牺牲的一方,而离石县竟还要横加破坏,将本县的二成捐税非法抢夺。离石方面则认为碛口之域由两县共管,货船捐税自然要由两县均分,绝非独归一方之利。在本次纠葛之后,学校的日常运作亦是阻碍横生,即以掌校一层而论,从学校成立至民国十九年的时段内,除中间由外人掌管四五年外,其余均由离石县人担任校长,所谓轮流分掌的计划终未能施行。

民国七年,山西省推行地方自治,将各地添设之县佐陆续裁撤。碛口镇分属于临县第三区和离石县第四区,各设区公所分驻于黑龙庙上、下两院。区长之下又设街长两人,仍需由临离地界铺户各自选举,办理官厅委办及商民决议等事宜。这一两县分辖,市镇管理体制分割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前。据刘光辅的实地调查,区公所作为驻镇的最高行政机关,其所承担的管理职能实则颇为有限:

区长所办理的事务,除维持一部分治安,及禁止烟赌外,其余全部力量,专注意在由西往东的贩烟旅客,因为这件事能发不知底的横财。至于地方各机关的主要人员和绅士之流以及各大商店的老板,虽有烟赌行为,而他们是在所不管的。他如与市镇尚有利益的事项,好像更不是他们范围以内的事项。^①

在日常行政管理之外,民国政府对碛口的经济管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常设的机构有:晋北椎运碛口分局,征收各种盐税;晋北盐务缉私管理处,稽查偷漏的私盐贩,发给官盐牌照,并监督收税处有无舞弊;碛口统税局,征收由陕渡河,路经所辖分卡的各种货物及牲口的统税;另有畜税局、屠宰税局、斗捐局、盐斤户户捐局、硝矿局、卷烟特税代办处、山西省银行派出所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市镇”的建置规模,昭示着碛口作为晋西经济中心的突出地位。

对于镇内最庞大的商人群体而言,为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以“碛口商会”的设立为标志,商人群体内部也实现了权力关系的整合。与区公所和警察分所不同的是,商会总领全镇关于商贸方面的各项事务,没有分治的窒碍。商会成立之初,还组织了独立于警察分所的商团武装,以资保卫镇民安全。民国五年,溃兵土匪肆扰陕境,“陕民之被淫掠者哭声震天,临隔一河惶恐万状,谣言四起,居民强半迁移”,碛口商团配合县佐王树仁、警佐焦学堂及巡官贺缉熙等“移船东岸昼夜防守,露宿二十余日,匪不得渡,临赖以安”。^②在抗战爆发前的三十多年内,商会历经3任会长,分别是:离石县西坡村人刘光隆,临县寨则山人陈懋勇,临县寨则山人陈懋勉。正是在清民鼎革之际,西坡村刘氏及寨则山陈氏成为该镇最具代表性的商人家族。以陈氏为例,其在咸丰年间以商道起家,后遭失败,及至光绪末年再次涉足碛口商界,经年累积,家业日趋隆盛。^③如前表5所列之“裕厚泉”“永生瑞”“玉泉成”等大商号均由陈氏家族经营,因商势颇盛,又有“陈半街”之称。民国三年,时任商会副会长的陈懋勇邀集社首、绅商公司筹议,并被推为工程总经理,于是年“秋冬两季购备材料,次年春兴工”,大规模整修了黑龙(下)庙。^④在商会的主持下,镇商又于民国八年集资修缮了上庙。庙

① 刘光辅:《山西碛口镇概况》,《党政半月刊》第14期(1929年11月1日)。

② 民国《临县志》卷12《略·兵防》,第6页a。

③ 陈绪曾:《外祖父陈翁昆山先生传》,王洪廷:《碛口志》,第99页。

④ 《重修黑龙庙碑记》(民国五年刊),碑存临县碛口镇黑龙庙内。

宇的重修,是本镇历经清民易代之后的一次重要事件,大量客商和坐商的参与标志着碛口商业已从动荡的时局中平稳过渡,更是折射出重新整合之后的商人群体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民国十四年,商会会长刘光隆举行新居落成典礼。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刘府正窑高悬两块匾额,右首题词“商界□□”,题款“恭颂碛口商会会长蕴山刘老先生落成雅苑”,落款“进士出身曾任工部主中郎吴命新题,陈懋勇赠”;左首题词“□□市廛”,其下是林林总总的商号名称,两行计有百十余家。匾额前矗立着两面旌旗,左旗题款“大乡望蕴山刘老先生堂构新成之禧”,右旗题款“碛口离临绅商等仝留影”。参加庆典者有商会副会长陈懋勇、董事陈懋勉、碛口厘金局局长、国民党驻榆林86师“驻碛口军需处”负责人等,其他合影人员自然是本镇富商和地方乡绅要员。^①从中也可以观察到,在这个各色人群所结成的复杂社区内,作为一方诸侯的商会在地方权力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四、结语

清代以降黄河中游水运的兴盛,促成了晋陕蒙沿黄经济区的形成和繁荣,本文所揭示的碛口镇总体性演变脉络的背后,也正是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写照。崛起于康熙末年的碛口镇,与河运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在河套地区开发与蒙粮内运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碛口凭借其优越的区位条件,特别是通达晋中地区的陆路交通优势,从山西众多沿黄城镇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官方与商民共同选择的粮运码头,东至太原南抵平阳的广阔经济腹地推动其逐步成长为晋西商贸重镇。清中叶以降,庙宇重修碑记中不断增加的商号数量昭示着市镇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形于前期以粮、油、盐为主的晋蒙单向货物集散,碛口的贸易类型和腹地范围也日益扩大,尤其是具有双向性质的晋陕贸易获得了充分发展,该镇也由此转变为一个连接华北与西北两大经济区的综合型商运码头。京绥铁路开通后,自上而下的晋蒙水运逐渐衰退,东西向的货物集散成为该镇的主要商贸形式。正是由于碛口对长距离水运依赖性的提前减弱,使其能够在近代交通变革的强大冲击下自如应对,继续保持着商业的繁荣。

在地理环境、经济模式以及行政区划等要素的综合作用下,碛口镇城的空间形塑过程也呈现出诸多独特之处。不同于多数从普通乡村脱胎而来的市镇,碛口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内均不需要与原始村落纠缠在一起,不仅聚落形成的逻辑起点十分明晰,而且在初现之时就呈现出纯粹的商业景观形态。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逐步形成了沿黄河与湫水河岸线性展布的带状聚落格局。同时,一种跨越政区的市镇区域意识开始显现,镇城在空间上有了“州地”与“县地”之分,这一空间维度的特性也始终影响着其经济和社会的演进。在市镇商业走向极盛的同时,渐形密集的镇域中心被划分成东、西、中、二道、三道五个街区,而道光朝以来迭起的水患问题,又不断重塑着镇城的街市形制。

鉴于碛口显著的经济地位,以及被视为晋西门户的冲要地理位置,注定其不可能游离于官方视野之外自由发展。从咸丰初年通判衙门的驻扎开始,政府对碛口的直接行政与经济管理从未中断。但对于一个纯粹的商业聚落而言,官方势力的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商绅为主导的社会运行秩序,在地方公共事务中,以西湾陈氏、李家山李氏、寨则山陈氏等为代表的巨商家族仍有相当的话语权。民国以降,商人群体置身于各方势力博弈的漩涡之中,也借助政治变革实现了内部权力关系的整合。无论是警察公所、县佐衙门抑或后来的区公所,分治格局始终阻碍着其对全镇的管控,它们在维持地方治安及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之外,并无意于过多介入市镇的日常运作。而仍由商绅掌控的碛口商会,不仅维持着自己在地方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更多地承担着市镇管理之责。

最后,若要对碛口镇聚落变迁史予以全面审视,关于其衰落的过程是不得不讨论的一个话题,而

^① 照片现存柳林县孟门镇西坡村村民刘世旺(刘光隆养子)家中。

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如抗日战争的破坏、战时及1949年后政策的影响、交通优势的丧失、黄河水患的冲击等等。其中,原有交通线路的基本废弃、运输方式的改变成为史家普遍推崇的一条解释路径。概言之,即是随着京绥铁路、同蒲铁路以及山西境内几条公路的陆续修筑,晋蒙之间黄河水运的重要性随之下降,晋蒙商贸的萎缩也就成为碛口衰退的起点和重要推力。^① 笔者在此并无意于完全否定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但如果我们回归到这一时期碛口镇的商业发展实态来看,晋蒙贸易规模的萎缩实则并没有动摇其商业根基,自然也就不具备推动其由盛转衰的巨大能量。相较于交通因素,战争的持续破坏和政治环境的变革应当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民国二十七年,省会太原的失守让碛口的东路货源急剧减少,传统商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此后,日军的多次扫荡及晋西事变一度使其成为多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争夺的区域,中共又相继建立起农村纺织业和向敌区作经济贸易斗争的公营商店,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以上综合因素导致大量的土著商人携带资本转移到陕西、天津等地,只剩万兴德等个别老字号和中小买卖勉强维持着市面贸易。^② 尽管于抗战末期似乎又开始走向中兴,并占据着晋西四大镇之首的位置,但镇内各字号的资本、规模、活动范围均远逊于前。在经历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后,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水旱码头,从此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History, Landscape and Regional Society of Yanhuang Towns in Shanxi Since Qing Dynasty: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Qikou Town

Zhang Junfeng, Bai Rujing

Abstract: In the last years of Kangxi, Under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etao area and the transport of Mongolian grain to the inland, Qikou began to rise by virtue of its superior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omprehensive commercial wharf linking the two major economic zones of North China and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transport between Shanxi and Inner Mongolia, the East-West two-way circulation of goods between Shanxi and Shaanxi has become the main trade form of the town. Unlike most towns born out of rural settlements, Qikou has presented a pure commercial landscape form since its rise, and the town space has developed linearly along the bank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Quishui River, eventually forming a “Five block” structure. In view of its remarkable economic statu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Xianfeng, Assistant Prefectural Magistrate Yamen and Lijin Bureau were set up one after another, the local government’s direct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control over Qikou has never been interrupted, but it has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d its social operation order dominated by merchant cla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erchant group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power relation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omplex local power system.

Keywords: River Transport, Towns, Commerce, Scenery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参见杜非:《商镇聚落的生成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考察——以山西省临县碛口镇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张世满:《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第140—141页。

^② 《碛口商业初步调查》(1947年10月18日),张扬等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第42页。